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湖南中医学院 编



样 本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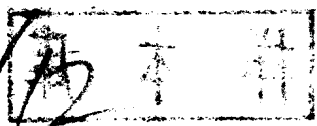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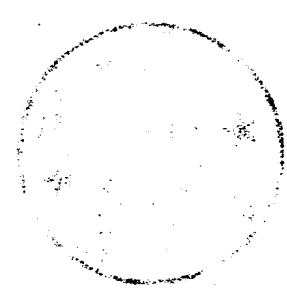
湖南中医学院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012218

2167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湖南中医学院编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27,000 印数: 1—30,000 印张: 6.25

统一书号: 14204·3 定价: 0.5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远古至战国时代的医药学	
(远古——公元前221年)	(4)
第一节 我国医药的起源	(8)
第二节 医和巫的斗争	(10)
第三节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	(15)
第二章 秦汉及三国时期的医药学	
(公元前221年——公元265年)	(23)
第一节 药理学的发展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25)
第二节 主要医学家及其成就	(27)
第三节 临证医学的发展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32)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的医药学	
(公元265年——公元960年)	(37)
第一节 脉学、针灸学的首次总结	(40)
第二节 药理学的显著发展	(43)
第三节 病源证候学的巨大贡献	(48)
第四节 临证医学的新发展	(51)
第五节 医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中外医药的交流	(58)
第四章 两宋金元时代的医药学	
(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	(62)
第一节 古典医籍的整理与新编方书的出版	(64)

第二节	药理学的新成就	(68)
第三节	医学的全面发展	(71)
第四节	金元四大学派和百家争鸣	(85)
第五节	医学教育与中外医学交流	(91)
第五章	明清(至鸦片战争前)时期的医药学	
	(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	(94)
第一节	药理学的发展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96)
第二节	温病学说的确立与传染病的防治	(102)
第三节	临证医学的重大发展	(113)
第四节	医籍的整理与著述	(125)
第五节	中外医学的交流	(127)
第六章	鸦片战争后至全国解放前的医药卫生	
	(公元1840——公元1949年)	(131)
第一节	西洋医学的传入	(132)
第二节	在反摧残斗争中的祖国医学	(135)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卫生面貌	(143)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146)
第七章	新中国的医药卫生	(151)
第一节	党的卫生工作方针	(152)
第二节	新中国医药卫生的巨大成就	(155)
第三节	我国医药卫生在国外的影响	(177)
第四节	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而奋斗	(181)
附录:	中国历代医学大事年表	(184)

前 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斗争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传统的祖国医药学，就是这优秀古代科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中药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也是古代防治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的总结。我国医学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医药学家和优秀的医药学著作，有些医药学成果在当时世界上还遥遥处于领先地位。中医中药不仅为我国民族的繁荣兴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丰富世界医学宝库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自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动统治者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无不推行歧视中医的反动政策，使祖国医药学遭到严重摧残。全国解放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党的各项卫生工作方针，使民族医学枯木逢春，重放光彩。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极左路线，采取摧残祖国医药学的反动政策，使中医中药事业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对卫生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又一次指明了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方向和道路，也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编写了这本《中国医学发展简史》。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参考兄弟单位的有关研究资料，同时，我们也作了一些实地考察。从许多生动丰富的历史事实和具体事例中，我们看到，祖国医药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无比正确，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编写《中国医学发展简史》的目的，是为了介绍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成就，探讨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更加明确今后医学发展的方向，以便为促进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遵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原则，我们采取了详近略远的编写方法，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医药学产生发展的概况加以评介，既要指出医药学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要说明医药学本身承前启后的相互关联。在古代部分，我们在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对医药知识的创造的基础上，突出了一些专业医药学家的贡献。对历代重要的医药学家及其著作，除了总结他们的成就之外，还指出其局限性，尽量做到全面分析，实事求是。本书对近代和现代部分，写得比较详尽，有许多医药史料和生动事例，都是实地考察来的。我们从新中国医药卫生的巨大成就中看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敬爱的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高度关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正确。

本书在编写期间，曾多次派人到湖北蕲州、长阳县乐园公

社、云南思茅、江西瑞金、井冈山、余江县及本省的湘阴、澧县、石门等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得到各地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编成后，承院内外许多同志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经反复修改后，最后由学院副院长谭日强教授审阅定稿。由于编者政治思想与业务水平都不高，不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对有些问题的评介甚或有误，衷心欢迎专家、教学工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

第一章 远古至战国时代的医药学

(远古——公元前221年)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医药学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无数生动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祖国医药学对我们民族的繁荣与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早在一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生活，到大约四万年以前，才逐渐进入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从人类社会的初期，就开始了卫生保健的萌芽。例如：从最初使用打制石器，发展为使用磨制石器、骨角制品与普遍使用弓箭；生产从采集、捕捉，发展为种植蔬菜谷物，驯养家禽家畜，这就提高了保障生活与抗拒凶禽猛兽的能力；衣着从披挂树叶兽皮，发展为以野麻织布，缝制衣服；居处从山居洞穴，发展为构木为巢，建造房屋，这就能比较有效地防御严寒酷暑，以适应自然气候的剧烈变化。人工取火的发明，“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能烧制日用陶器，使人类生活从“茹毛饮血”进而为熟食，更是人类卫生

保健的重大进步。食物烧熟，不仅易于消化吸收，增进营养，而且还能杀菌消毒，大大减少肠胃疾患与寄生虫病的发生，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发展。这说明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人类的卫生保健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同时，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产生了原始的医药，因而有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等关于医药起源的历史传说。

夏、商、西周（约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建立了国家机器，过着奢侈腐朽的寄生生活，对奴隶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奴隶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可以被奴隶主任意屠杀、殉葬，生命没有丝毫保障。但正是奴隶们以艰苦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医药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夏朝初期，就发明了谷物酿酒。商代墓穴中，便发掘出大量的酒器。酒和医药一开始就发生了联系（“醫”字即从“酉”（酒）字衍生），并出现了药用的酒类——“醴醪”。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商代已应用青铜大量制作生产工具，同时也创制了医用铜制刀针，为医疗提供了金属器械。在制陶业方面，夏代已有了较为精致的陶制釜、盆、碗、罐等，商代在日常生活中更广泛使用陶器，同时烹调技术也有进步，因而在医药中出现了“汤液”的发明创造。在天文学方面，夏代已有历法，商代已知大月、小月、平年、闰年和四季节令的区分，到了西周，《周礼》中有春有首疾（流感），夏有癰疥疾，秋有疢寒疾，冬有嗽上气疾的记载，从了解疾病发生与季节变换的关系，进一步对四季

多发流行病有了初步规律性的认识。文字的创造，更有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传播和总结。甲骨文、金文与《易》、《书》、《诗》等古籍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医药的史料。例如：仅据323条商代“卜辞”的统计，其中所载的病名就有22种。如对于寄生虫病的认识，比一般认为最早的印度《禳灾明论》的记载，早700多年。关于龋齿的记载，比埃及、希腊、印度等世界文明古国也早1000多年。到了西周，出现了专业医生，还有国家的医事组织与医学分科。《周礼·天官》记载：天官下设“医师”两人，总管医政。以下分设“府”、“史”、“徒”等医政管理及杂工人员。医学分为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疡医（外伤科）、兽医等四科，还建立了病历记载与医疗考勤等制度。在群众中，有了洗脸、洗澡、洒水扫地及设置便所、畜圈等讲求个人与环境卫生的良好风尚。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变革时期。特别是战国时代，已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早期的封建社会。这时，铁制农具和牛耕逐步推广，扩大了耕地面积；铁制农具、兵器的大量制造，出现了不少冶铁业的中心；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的使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人口比较集中的繁华城市。广大奴隶从农奴制度下逐渐解放出来，成为佃农；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贵族成了新的统治阶级。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促进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进步。在学术思想领域有了道家、墨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术流派，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首先，专业医生大量出现。他们在社会上非常活跃，开展了对迷信巫术的积极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巫术对医学发展的严重干扰。当时著名的医生如医和、秦越人（扁鹊）等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其次，临证医学也有飞跃的进步。例如：在诊断方面，《史记·扁鹊列传》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的记载，说明我们民族独创的诊断技术——“四诊”，已经初步具备。对疾病的认识和鉴别逐渐详明。据《内经》的粗略统计，所载病名达200种以上。例如风病就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胃风、首风、漏风、脑风、内风、肠风以及大风、风痹、风厥、风疝、劳风、酒风等，所有这些都有或详或简的具体描述。在治疗上，除了普遍使用药物、针灸治疗以外，还有按摩、导引、汤熨、毒熨、熏蒸、洗浴等多种外治方法。在药理学方面，这时还没有出现专书。但是，《山海经》却为我们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用药的部分情况。该书载药物125种，其中有植物药53种，动物药65种，矿物药3种，治疗疾病达数十种之多。同时，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古代哲学所提供的理论指导，推动了我国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产生了我国现存最古的医学理论专著——《内经》。这时，人们的卫生保健知识日益丰富，对个人与公共卫生更加重视。在群众中，有了经常性的灭鼠除虫，并运用了抹墙、堵洞、药熏等多种方法。《左传》还有“国人逐癘狗”即大规模捕杀狂犬以防狂犬病的记载。在婚姻方面，同姓不婚已成习俗；对早婚的危害，也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礼记·曲礼》篇说：“三十曰壮，有室。”从健康卫生方面考虑，把男子三十定为结

婚年龄是比较合理的。远在两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医药学就创造了如此光辉的成就，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第一节 我国医药的起源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我国医药的起源，与我国劳动人民最早的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远古的历史传说表明：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也就开始发现了植物药。例如，从采集的植物中发现：有的香甜可口，有的苦涩难咽，有的分别能使人呕吐、腹泻、昏迷或死亡；但也因为同时食用了某些植物而使中毒的现象得以缓解。经过这样的反复尝试，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分别具有对人体有益、有害或治病的不同作用。以后，人们还试用某些有毒的植物毒杀禽兽，从而发现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独特效果。直到现在中国及其它古书中还保留着如鸡毒(乌头)、鱼毒(芫花)、狼毒等植物的名称，说明人们已经更深入了解到这些植物的毒性作用。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更注意识别、采集、选择和栽培各种植物，因而发现了更多的植物药。《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史料反映了原始农业和发现植物药的密切关系。

渔猎、畜牧是原始人的主要生产劳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吃到多种动物，因而也就能发现某些动物（包括油脂、皮肉、

筋血、骨角等)的药用价值。《山海经》记载:“河罗之鱼食之已痛。”“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这便是我国古代人们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例证。《素问·腹中论》所述血枯病的治疗,就是我国古代以动物药为主所组成的方剂。

原始人在寻找食物与猛兽搏斗或进行氏族部族之间的争斗中,发生外伤是常有的事。开始用树叶、草茎、灰土等包扎敷治,因此发现了外用药并逐渐积累了外治的方法。

随着人工取火的发明,火被广泛地应用于医药。原始人在围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以烧热了的石块和砂土,用树皮兽皮包裹贴附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可以得到更持久的局部取暖。久之,他们逐渐发现这样的局部加温可以消除某些痛苦。例如,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痛或因寒湿所致的关节痛等,这便是原始的热熨法。以后,由于不断总结经验,进而用树枝或干草作燃料,进行局部固定的灸烤,取得更好的疗效,逐渐形成了灸法。《庄子》中有“丘所谓无病自灸也”的话,说明到了春秋时代,灸法的临床应用已经相当普遍。

由于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不断改进,人们也逐渐积累了运用工具治疗疾病的经验。最早创制的医疗工具,可能就是砭石。《说文解字》称:“砭,以石治病也。”原始人从最初运用石针,进而运用骨针,竹针,青铜针。我国历史上有“伏羲制九针”以治疗疾病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医疗中应用针刺工具与针刺技术的发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医学这座伟大的宝库,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与疾

病的斗争中逐步积累、创造的。《素问·异法方宜论》有关于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炳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按摩从中原来的记载，说明祖国医学的多种疗法，是来源于我国东西南北中各族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古代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尝试，并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才逐渐积累起各种医药知识。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所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这段话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从开始发现药物到汇集成伟大的医药学宝库的生动过程。因此，关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只能认为是我国远古时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化身，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我国劳动人民发明创造医药的伟大象征。

第二节 医和巫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鬼神观念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范围狭隘，同自然的斗争软弱无力，因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疾病、生死等，无不感到神秘莫测。原始人的鬼神观念，最初就是这些支配他们的自然力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随后，鬼神的幻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力的作用，经历了极其不同与极为复杂的人格化。到了原始社会末

期，特别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作为地上王权统治的反映，也在“天国”建立了更加广泛的神权统治。国王自命为“天帝”的儿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间世界的。同时，从阶级分化中，出现了自称能交通神人、专门从事迷信活动的巫。奴隶主在其统治机构还设置了“大祝”、“大卜”、“司巫”等官职。巫以神的代表身份，参与国家政治，掌握着祈祷祭祀、占卜吉凶、医治疾病等大权。他们宣扬疾病是由于鬼神降灾，以祈祷、占卜、诅咒等手段进行所谓“逐疫”、“驱疾”的欺骗活动。有些巫师也窃取了某些医药学知识，将它披上神秘的外衣。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了医巫混杂的现象，从而使他们迷信巫术活动更富有欺骗性。这样，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医药学与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巫术，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展开了长期的对立和斗争。

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激烈的阶级斗争，促使医和巫的斗争更加尖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唯心主义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荀况明确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韩非则更严加痛斥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们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障碍医学发展的巫术。人体生理、解剖学冲破了迷信思想的束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战国时代，对人体的宏观构造，如皮肤、肌肉、血脉、关节、骨骼、九窍、五脏、六腑、脑的生理功能，都有了一定的认识。《灵枢·经水篇》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根据《内经》记载，人的食管长度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1:35，而现代解

剖测量的结果是1:37, 这比例就非常接近。《素问·举痛篇》还有血液在血管内“流行不止, 环周不休”的记录, 比英人哈维于公元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几乎要早两千年。这些成就, 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也为批判巫师所宣扬的天命论、鬼神致病论等谬说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许多专业医生更直接向巫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如医和、秦越人等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实践, 总结劳动人民的医药经验, 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唯物论的病因说与唯心论的鬼神致病说是医巫斗争的焦点。公元前541年, 医和受秦国的委派去为晋平公治病。他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以后, 肯定晋平公的病是由于情欲过度所致, 而决不是由于鬼神作祟。他还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理论, 指出: “天有六气, ……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 过则为灾。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 风淫末疾, 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医和的六气病因论认识了外界环境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是我国病因学的开端, 也是对唯心论的鬼神致病说的否定。

秦越人(扁鹊)(图1)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 勃海郡鄚州(今河北任丘县)人。他行医于齐、赵、周、秦列国, 是我国医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民间医家,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图2)。他为创立脉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有卓越的医疗技术, 精通内、妇、小儿、五官各科。例如: 有一次, 他路过虢国, 虢太子患了“尸蹶”病, 突然昏倒, 不省人事。虢宫内外忙于求神问鬼, 以祈祷为太子消灾弭难, 其